

特稿

向毛泽东学习强弱转化

■郝敬东

编者按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强弱转化、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极为光彩夺目的一部分,形成了指导强弱转化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强弱转化的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和战争指导艺术,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

科学对比战争力量,是实现强弱转化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认识强弱。客观性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特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他正是把这一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到军事领域,提出按照战争的本来面貌来考察强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客观分析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领导和土地革命等特点,反映了与国民党的强弱对比,这也正是他强调的:“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

强弱是双方综合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全面地了解战争双方诸要素的矛盾关系及其各方面特点。抗日战争时期,他综合分析中日军力、经济力、组织力、战争性质等因素,指出这些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并强调“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正是基于此,才得出持久抗战、中国必胜的结论。对此,他曾形象地指出:“一个蚂蚁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反对认识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

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者照搬别国经验,低估农村根据地,把敌人看得过于渺小,盲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结果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这种错误认识,正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去做,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因此,认识强弱要反对背离客观的主观性、僵化的形而上学。否则,就会陷入唯心论和机械论的泥坑,难免碰钉子。

“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

毛泽东同志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因为,强弱是相对的,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是实现强弱转化的依据和条件。

力量强弱是相对的。毛泽东同志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强弱。他在抗日战争中指出,日本军力虽强,但是国小,地小、物少、人少、兵少,退步、寡助;中国军力虽弱,但是国大,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进步、多助。他在谈到游击战我军强弱时指出:“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可见,强者,是从全局上讲的,在某一局部某一时间可能弱;弱者,也是从全局上讲的,在某一局部某一时间可能强。

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对抗中可以互相转化。如果没有转化,以弱胜强是不可能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军弱,是指战争初期,相对弱;强,是指战争结局,我军经过由弱变强,敌人由强变弱,最终以变强的力量战胜变弱的敌人。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

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可见,力量的消长变化体现在战争的整个过程和结局。

转化须具备一定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同样,强弱转化也是有条件的。解放战争时期,正因为我们的战争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拥护,才能由弱变强。如果没有这一政治基础,想摆脱弱势地位、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强弱对比的相对性,孕育着强弱转化的可能性。要实现由弱变强,应从条件入手,具体分析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现实条件和可能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然,转化就是空话。

“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要积小胜为大胜,为争取最后胜利创造所必要的一切条件。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弱者面对强者,首先是“敢不敢”“会不会”斗争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面对敌对势力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毛泽东同志说:“要在战略上藐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这也是他强调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充分体现了藐视与重视的辩证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完美结合。

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弱小、敌人强大,红军远离军阀混战,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才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他还形象地指出:“‘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可见,弱者先让一步,是有计划的战略步骤。若不退让,和强者硬拼,必危及军力。同时,坚持后发制人,但

不排除战役战斗上的先机制敌。

在局部上造成以强对弱。我军在革命战争中长期处于全局上的劣势,但在战役战斗上都是绝对优势,这才保证了具体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对此指出了明确的强弱转化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可见,弱者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造成局部的强,然后不断地促进局部量变到质变,最终通过一系列局部质变推动全局质变,从而实现强弱转化。

扬长避短。“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强中有弱,弱中有强,弱者要发挥其强的因素,对抗强者弱的因素。抗日战争初期,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目的就是发挥我军在山地作战的优长,避开与敌大规模的正面对峙。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正因为我军发挥长处、避开短处,灵活运用,才有了后来遍布敌后的神出鬼没的游击战。

勇于接受局部的暂时的失利。有时候,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是为了全局的永久的保存,是以必要代价换取更大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人一次次“围剿”,冒险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同志针对不愿丧失土地等问题时指出:“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可见,弱者忍受不利,是为了消除其他的一切不利,为了更大的胜利。

总之,弱者要战胜强者,就要不断积累优势,实现强弱转化,才能赢得最后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强调的:“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群策集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将相同的两张照片贴上罪犯、科学家两种身份标签,分别给被测试者甲、乙观看,而后根据外貌分析其性格特征。结果甲说:深陷的眼睛暗藏着内心的险恶;而乙则说:深沉的目光折射出思维的深邃。同一个人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这说明第一印象所形成的心理定式,能够干扰甚至主导人们对事物的后续判断。这就是所谓的“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优先效应,当不同信息输入人脑时,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先输入的信息,并不自觉地将后输入的信息整合到前者在大脑中所形成的记忆结构中,习惯于用前者解释后者,即使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时,也会屈从于之前的信息,以形成整体一致的结论。

“首因效应”不仅作用于社会领域,在战争领域也屡见不鲜。《孙子兵法》提出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等对抗谋略,就是利用“首因效应”给对方指挥员设置的思维陷阱。例如,二战时,德军利用法军对阵地战经验的迷信,以少量兵力佯攻马奇诺防线,牵制法军主力。同时,装甲集群从被认为机械化部队不可能通过的阿登森林出击,攻入法国境内,成功实施施坦因计划。

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所谓“判断”就是通过分析,将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残缺不全的侦察材料加工处理成情报信息,是作战指挥决策的首要环节,判断结论的客观性影响后续决策的正确性。作为判断的主体,指挥员易受到“首因效应”的影响:平时所掌握的敌方作战条令、惯用法、作战演习等知识经验,易使其对敌形成相对固定的认知体系,并以此作为判断情报信息真伪和预测敌方行动的依据;因自身秉性特点、认知偏好等因素影响,有可能落入对方故意设定的陷阱,等等。

认知的局限性、作战的对抗性,决定了“首因效应”客观存在于指挥决策活动中,而且人们很难摆脱其干扰。为此,应高度警惕指挥决策过程中的“首因效应”,并尽量减少其不利影响。一方面,在决策组织上,注重决策团队的多成分编配,确保多知识结构支撑决策、多维度视角评估决策,降低决策人员认知偏好、固有印象等主观因素对决策客观性的影响。既要有熟悉对手作战理论、条令、习惯甚至文化的专家人才,又要有通晓一般作战原则、规律的参谋人员,以便站在对手和第三方的角度审视决策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决策思维上,注重综合运用

指挥决策需警惕「首因效应」

董伟 唐林彬

多种思维方式,减少决策人员因第一印象形成思维定式而误入对手陷阱的风险。如,用极限思维评判信息的可信度,判断敌最大可能,较小可能和最不可能的三类行动方案,以此论证情报信息的可信度;用批判思维衡量信息的相关度,防止受敌干扰信息影响而偏离决策方向;用整体思维评估信息的逻辑性,按逻辑规则将前后信息进行整合,如各观点相互佐证、互为支撑,则信息符合逻辑;用反思思维考量信息的合理性,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敌方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防止以自我为中心来决策。

有人/无人机如何协同作战

■赵先刚 李 睿 刘 浩

前沿探索

制权向有人机的适时授予,是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过渡形态。

当前,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主要通过无人机控制站,由上一级甚至多级指挥机构进行协调,而同处战斗一线的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尚无无法实现“面对面”的直接信息交互,从而降低了情报信息交互的时效性,影响了协同配合的及时性,难以应对快节奏、强对抗的空中作战。在此背景下,应注重增强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的互操作性,达成更加直接的战场信息交互、作战支援与行动配合,以实现共同编组、整体作战。根据无人机的性能和控制技术水平,从能力逐渐发展的角度,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有以下三种形态。

后方控制的信息直传式协同。即无人机的所有行动由后方控制站控制,有人机直接对无人机获取传感器图像、数据,用于支持自身作战行动或转发其他作战力量使用。这种协同形态只需打通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的通信链路即可达成,是最容易实现,也是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最基本的协同形态和最广泛的运用方式。

此协同形态,无人机可与有人侦察机协同,进行多源目标信息获取、处理,用于战略、战役筹划决策和联合作战行动实施;可与有人作战飞机协同,引导空中编队进行空战截击或实施对地、对海突击。在运用中,有人机可接收1架或同时接收多架无人机传感器获取的目标信息;无人机可向1架或同时向多架有人机传输目标信息。

有限控制的载荷配合式协同。即在后方控制站控制无人机飞行的前提下,有人机根据授权可以对无人机进行传感器任务动态分配和武器系统控制。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具备了一定的互操作能力,可以有限地满足有人机对无人机的协同需求。这种协同形态是在打通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通信链路的基础上,增加了有人机控制链路,实现了载荷与无人机的实时分离控制,以及载荷控

制权向有人机的适时授予,是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过渡形态。

此协同形态,无人机可与有人侦察机协同,并根据有人侦察机需要,调整传感器的工作模式与探测方向,以获取更为精准的目标信息;可与有人作战飞机协同,在适当空域及恰当时机,对空中编队进行精确引导与打击效果评估,或作为有人机的“飞行弹药库”协同配合实施火力作战。在运用中,有人机可对1架或同时对多架无人机载荷进行控制,并接收无人机回传的目标信息;无人机可连续接收1架或分时接收多架有人机发送的载荷控制指令,并向有人机传输目标信息。

全态控制的一体编组式协同。即后方控制站控制无人机起飞后,适时将指挥控制权移交给有人机,或由有人机直接投发并控制无人机行动。有人机与无人机一体编组,能够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态势进行信息融合处理、任务规划与决策、指令分发和编队行动控制,遂行各种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强对抗性作战任务。这种协同形态需要有人机在飞行性能、武器载荷等方面与有人机相匹配,并具有一定自主行动能力,同时有人机实现了对编队的智能控制,是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的高级形态和未来发展方向。

此协同形态,通常采取1+X或X+X编组模式,即1架或多架有人机与多架不同功能类型的无人机共同编队,具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运用中,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编队在有人机指挥控制下,独立或协同其他作战力量遂行预警探测、防空反导和对地/对海打击等任务。作战过程中,后方控制站负责监视编队中无人机的行动,必要时介入控制。

以上三种协同形态是由协同作战技术决定的,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但是,在认识上我们不能仅把最终的高级形态认为是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低级形态并不会因高级形态的形成而消失,三种协同形态将会长期并存发展,应该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和作战对手灵活选择运用。

现代城市作战怎么打

■苏冠峰

观点争鸣

城市作战被称为“地狱里的战争”,是世界公认的最难打的作战样式之一。近年来发生的局部战争中,现代城市作战绕不开、躲不过,并且较之以往地位作用更加突出,战场环境更加复杂。打赢具有智能化特征的现代城市作战,应当遵循更具针对性的作战指导思想。

打好政治军事战。现代城市作战广受关注、高度敏感,是“镁光灯下实施的作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政治外交被动。因此,现代城市作战不仅要打好军事战,更要打好政治战;不仅要赢得军事主动,更要掌握政治主动。应当着眼有效性,重点打击或夺取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目标,最大限度动摇敌抵抗意志,撼动敌政治基础;着眼正当性,积极宣传己方作战行动的正义性,始终占据道义的高制高点;着眼合法性,依据国际法和交战规则,严格控制作战手段运用和打击力度,减少附带损伤,并做好调查取证工作,确保作战行动有理有利有节。

打好信息主导战。城市通常结构布局复杂、高层建筑林立、道路纵横交错,地上地下一体、楼上面、屋里面、墙后面、地下面,到处都可能藏匿之

的。现代城市作战应避免与敌打成持久战、消耗战,应当摒弃粗放式的传统战法,做足“点”的文章,通过毁点瘫痪、夺点控域,实现以小博大、以点制面的作战效果。对于信息节点、指挥节点等维系敌城防体系运行的节点目标,应当以“打”为主,通过毁敌节点,瘫痪敌城防体系。对于制高点、枢纽点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要点目标,应当以“夺”为主,精打巧夺建立“桥头堡”,把敌人引出来打。在预定区域聚歼开敌。对于水、电、气、油以及医院、学校等民生敏感目标,应当以“控”为主,实施军事管制,精打藏匿之敌。

打好人机协同战。城市特殊的战场环境限制了传统武器装备和作战手段的运用,却为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运用提供了广阔舞台。智能化武器装备具有轻便精巧、机动敏捷等突出特点,能够弥补人员在城市作战中的不足。但是,城市作战目标多元、军民混杂,智能化武器装备可能被敌误导、误打误伤,需要人员辅助印证、主导决策;城市敌情隐蔽“死角”多,智能化武器装备很难“一打了之”,需要人员跟进清剿、夺占控制。因此,现代城市作战应坚持人在作战中的主导作用,同时重用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打头阵”“当先锋”,升空自主游弋猎杀或者潜入建筑物自主识别打击。通过人机密切协同,使城市作战中传统的“人”战与智能化

的。现代城市作战应避免与敌打成持久战、消耗战,应当摒弃粗放式的传统战法,做足“点”的文章,通过毁点瘫痪、夺点控域,实现以小博大、以点制面的作战效果。对于信息节点、指挥节点等维系敌城防体系运行的节点目标,应当以“打”为主,通过毁敌节点,瘫痪敌城防体系。对于制高点、枢纽点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要点目标,应当以“夺”为主,精打巧夺建立“桥头堡”,把敌人引出来打。在预定区域聚歼开敌。对于水、电、气、油以及医院、学校等民生敏感目标,应当以“控”为主,实施军事管制,精打藏匿之敌。

打好精确火力战。城市防御之敌大多依托建筑物或者藏匿于地下实施抵抗,对其毁瘫面临不少困难。有些叛乱人员甚至混迹于普通民众之中,甄别难、定位难、打击难。现代城市作战应当尽可能避免对平民的误伤,减少对建筑的损毁,避免“狂轰滥炸”,应慎选目标,实施精确火力打击。应当对敌城防体系进行详尽分析,精准确定打击目标及预期效果;根据打击目标的性质及防御强度,精准选择打击火器及适配弹药,精准聚合体系内的精确打击力量,达成对敌城防体系的精准毁瘫。必要时可建立绿色通道,剥离出重点军事目标,避免附带损伤。

打好以点制面战。一线平推、步步攻坚、逐街逐巷争夺的传统城市作战战法,难以达成快速高效稳城控局的目的。



请扫描二维码 延伸阅读